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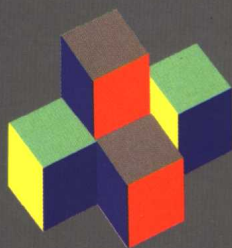
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美] 威廉森·默里

[英] 麦格雷戈·诺克斯 编

[美] 阿尔文·伯恩斯坦

时殷弘等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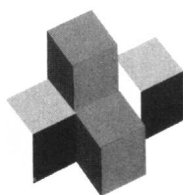
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美] 威廉森·默里

[英] 麦格雷戈·诺克斯 编

[美] 阿尔文·伯恩斯坦

时殷弘等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Copyright © 1994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简体字版©2004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 (美) 默里 (Williamson Murray),
(英) 诺克斯 (Macgregor Knox), (美) 伯恩斯坦 (Alvin Bernstein)
编; 时殷弘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5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书名原文: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ISBN 7 - 5012 - 2175 - 8

I. 缔... II. ①默... ②诺... ③伯... ④时... III. 国际
关系—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5155 号

图字: 01—2001—4211

书 名	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 Dizao Zhanlüe: Tongzhizhe、Guojia yu Zhanzheng
责任编辑	袁路明 杨连春
责任出版	夏凤仙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87 × 1092 1/16 43¼
字 数	75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一版 200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

专家委员会

袁 明 时殷弘 秦亚青

王缉思 阎学通 倪世雄

编辑委员会

姚东桥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勇 王 联 于铁军 张小明

潘成鑫 袁路明 周宇君 夏力宁

本书译者

时殷弘

杨光海 葛腾飞 朱昕昌 袁胜育

宋德星 崔建树 刘飞涛 张 春

总序

编译这套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

二十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中国向世界开放，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各种渠道涌入，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比起前几次“西学东渐”来，其规模和内容都扩大和丰富了许多。在众多的“西学”中，关于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说占了一块相当突出的位置。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追想前一次“西学东渐”，即上个世纪的“五·四”时期，很少有西方“国际关系学”进入中国。这与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听任列强宰割的国际地位有关。“救亡”都还来不及，何能奢谈“国际关系”？不过，尽管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中，还是有一些介绍欧洲外交史的著作问世。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专门开设了国际研究课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得以在中国较大规模地传播，恐怕与美国的力量（亦可称其为“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综合）和中美文化交流活跃这一现实有关。“西学”中的国际关系学说俨然就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说。“以美国为主”是这一次“西学东渐”的一大特色。

然而，美国并不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发源地。三百多年前，在欧洲出现了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时，美国尚未立国。北美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稍后一些，当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构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说的一些基本理论时，美国还在忙于地理上的拓荒。当时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闭关锁国的中国人多。

美国真正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重镇，其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因为欧洲已不是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这

一中心舞台向欧洲的两侧转移。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从欧洲“引进”了一批重量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和实践者，再辅之以雄厚的资金支持，“国际关系学”便在美国得到了真正的大发展。当然，这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有直接关系。这便是20多年前中国国门打开，又一次“西学东渐”时中国人面对的那种美国国际关系学派林立，文章汗牛充栋的蔚然大观。再到美苏“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支配性的超级大国之后，其话语霸权在国际关系这一领域中就更加明显了。这一显然携带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力量的现象，随着“全球化”，还在持续显现。

不过，于那些需要对世界有尽可能透彻了解的当代中国人，尤其是致力于学习国际关系的青年学子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一些本源的东西，如西方的文明史，扩张史，国际关系史，以及背后的基本观念和思想，或谓陈乐民先生多次提醒的，要注意西方“精神的历史”。这种“精神的历史”当包括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本性思考在内。这一本性问题，实际上是西方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它们产生在欧洲，后来又被一代代美国学者们继承了。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刘同舜先生在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作序时，特别地指出“就核心概念的归纳和理论框架的锤炼而言，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的哲学基础、历史底蕴和分析方法，较之‘主流’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似高出一筹”。

所以说，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这一套书，是在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的“精神的历史”。这些书是西方学界认可的真正的“经典之作”，被作为“经典教材”一版再版，不断成为西方国际政治课堂中的必读书目，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国际政治战略人士、外交家和学者。现在看到的国际关系的各种表象，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战略考虑，其实都出于他们的“精神历史”的本源。西方的大学，包括美国大学的课堂，并不数典忘祖。他们讲授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亦多要从古希腊讲起。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是曾用了大工夫，把修昔底德的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翻烂吃透了的。这是他们精神家园的最终皈依。我们要了解西方，不能不了解他们的精神家园。

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核心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所编译的这套书

中做了比较透彻的介绍。应该说,介绍西方国际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或本源性思考,是这套书的一大特色。中国读者和青年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套书了解西方的这一领域学说的核心部分,如果仅仅停留在阅读一些介绍性的著作上是达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介绍性的著作亦必不可少。

实际上,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人很容易迷失。牛津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亚当·罗伯茨 1991 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我们都不应忘记以现代面目出现的思想体系常常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为了加强他的观点,他还引用了法国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德·托克维尔的一段名言:

“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魄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罗伯茨教授指出,德·托克维尔的讽刺性评论特别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他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特别适用”,但当我们读了这一套书后,倒是不妨去深想这个“百年命题”。

与此相关的,这套书的作者都是在西方被公认的“大家”或“大师级人物”。他们的共同点是多具欧洲背景。这与上面所提及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是承接的。他们代表着欧洲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并走上向全世界扩张道路的实践的理論思考。国际关系理论只能从实践中总结,而不能只在书斋中进行概念上的自我循环。这些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切关注,是他们的著作能够站住脚的根本,即他们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国际政治实践,而他们的贡献是将这些实践变成一种历史哲学。

复杂纷繁的世事一旦被透彻简洁的方式提高到哲学境界,它们便走出了粗俗和原始,便具有了知识美感。更何况作者们所提出的历史哲学命题对后人仍有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古人用诗的语言所表达的,也许就是这个意境。

担纲这一套书翻译工作的主力是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中已具成就的中年学者,还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他们都有多次赴欧美日发达国

家深造和在外讲学、交流的经历。他们对中西政治文化的体悟，既来自于书斋，亦得之于实践。翻译原著，其实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绝不是粗通一些外文便可对付得了的；要编辑出版成书，也有种种不易。直至今日，大部分译稿都已脱手之际，译者仍对文稿中的一些专门用语苦思冥想。因为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有时确实无法将西方大师们思考的神貌用完全相符的中文语词表达出来。“难哉译事”，难是难在“神”上，而非“词”上。但是，如上所说，这一批中青年学者都受过两种文化的教育，现在又都在中国的著名高校执教，他们在实践中交融了两种文化的优长，更深感要让年轻的中国学子们了解西方原著的必要。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有了这一套书。这是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的。

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他们视野开阔，既看到了世界的过去，也想到了中国的未来。他们的良苦用心和勤恳敬业，是支持我们完成翻译这套书的重要精神支柱。

袁 明

2002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论战略 / 1

威廉森·默里 马克·格利姆斯利

地 理 / 8

历 史 / 11

政权的性质 / 14

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 / 14

经济因素 / 19

政府和军事体制组织方式 / 21

缔造战略 / 23

结 论 / 25

第二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
战略 / 26

唐纳德·卡根

第三章 尚武国家的战略：罗马及其对迦太
基的战争（公元前 264 至公元前
201 年） / 59

阿尔文·H. 伯恩斯坦

导言 / 59

罗马民众的作用 / 60

罗马寡头集团的精神气质 / 63

同盟的结构 / 67

与迦太基的第一次冲突 / 71

胜利的果实与失败的代价 / 77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 / 80

结束语 / 88

第四章 14 至 17 世纪的中国战略 / 90

阿瑟·沃尔德伦

第五章 哈布斯堡西班牙的战略缔造：腓力二世的“霸权图谋”（1556至1598年） / 119

杰弗里·帕克

导言 / 119

西班牙大战略诸要素 / 123

西班牙大战略实践 / 134

无敌舰队惨败之后 / 152

第六章 全球战略的起源：英国（1558至1713年） / 158

威廉·S. 迈尔特比

第七章 追逐荣誉：路易十四治下的战略缔造（1661至1715年） / 188

约翰·A. 林恩

决策体制：国王与国务会议 / 189

决策背后的价值观念 / 193

资源和战略 / 197

阵地战和战略 / 203

法国战略的三个时期 / 207

结束语：路易与速战幻影 / 215

第八章 向强国边缘迈进：美国（1783至1865年） / 217

彼得·马斯洛夫斯基

邦联条例、宪法和军事安全 / 219

考验宪法的军事条款（1789至1815年） / 227

扩张中的帝国（1815至1860年） / 238

内战 / 247

第九章 一个民族国家的战略无常：普鲁士 /德国（1871 至 1918 年） / 256

霍尔格尔·黑尔维希

对战略的国内制约 / 259

外部威胁 / 263

缔造战略：一项检验性实例 / 269

实施战略：大战 / 279

结论 / 289

第十章 疲惫的巨人：英国的战略和政策 （1890 至 1918 年） / 294

约翰·古奇

结论 / 323

第十一章 充当决定性的砝码：意大利的战 略（1882 至 1922 年） / 325

布赖恩·R. 沙利文

探寻意大利国家战略（1882 至 1900
年） / 326

追求大国地位（1900 至 1908
年） / 332

三国同盟的崩溃（1908 至 1914
年） / 338

中立和参战（1914 至 1915 年） / 347

大战中的意大利（1915 至 1918
年） / 355

和平的苦果（1918 至 1922 年） / 363

第十二章 通向意识形态战争之路：德国 （1918 至 1945 年） / 373

威廉·戴斯特

- 战败的后果 / 374
-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战略 / 379
- 重新武装与军方：战略的衰落 / 393
- 希特勒的战略 / 403
- 战争与毁灭 / 408

第十三章 帝国的倾覆：1919 至 1945 年的英国战略 / 417

威廉森·默里

- 背景 / 417
- 行政机器 / 421
- 战略的经济制约 / 426
- 对威胁的认识 / 431
- 英国战略的贯彻 / 438
- 结论 / 454

第十四章 幼稚天真的战略：美国（1920 至 1945 年） / 456

埃利奥特·A. 科恩

- 导言 / 456
- 遗产 / 457
- 美国的体制（1920 至 1945 年） / 462
- 威胁和挑战 / 467
- 资源 / 472
- 战略决策 / 481
- 结果 / 490

第十五章 安全幻觉：法国（1919 至 1940 年） / 495

罗伯特·A. 道蒂

国家安全体制	/ 496
寻求安全	/ 500
法国联盟网络的建立	/ 504
不适意的西欧邻国	/ 511
法英参谋人员会谈	/ 516
法国军事战略的形成	/ 518
结论	/ 525

第十六章 阶级战争的战略：苏联（1917 至 1941 年） / 528

厄尔·F. 齐姆科

四面受敌	/ 528
伏龙芝与军事改革	/ 536
屠哈切夫斯基时期	/ 542
斯大林派系	/ 548
与时间赛跑	/ 553
战略的框架	/ 561

第十七章 以色列战略的演变：不安全感与绝对安全追求 / 565

迈克尔·I. 汉德尔

地缘因素：领土性必须	/ 565
心理因素	/ 572
人口因素：凶险的预兆	/ 575
经济奇迹	/ 577
技术：以色列战略的万应灵药	/ 580
国内环境与战略缔造	/ 584
军政关系、外交和国家安全	/ 593
“第七场战争”：低烈度冲突和反恐怖行动	/ 595
以色列的战略：从绝对安全到为和平	

冒险 / 597

结论 / 606

第十八章 核时代的美国战略（1945 至 1991 年） / 609

科林·S. 格雷

美国与均势 / 609

战略源自国内 / 611

变化的图景 / 613

不变的图景 / 615

历史和战略文化 / 618

漠视历史 / 621

工程学风格和技术式解决 / 621

缺乏耐心 / 622

无视文化差异 / 623

大陆观念与海洋情势 / 624

对战略的冷漠 / 625

诉诸武力：姗姗来迟但规模

巨大 / 626

规避政治 / 628

威胁、政策目的和资源 / 629

战略概览：核因素 / 631

结论：战略表现评估 / 641

第十九章 结论：缔造战略方面的连续和变革 / 646

麦格雷戈·诺克斯

官僚机构 / 647

大众政治 / 654

意识形态 / 660

技术和经济力量 / 671

从往昔之路到未来之道 / 677

第一章

导言：论战略

威廉森·默里
马克·格利姆斯利

“战略”概念证明众所周知地难以界定。许多理论家试图界定这个概念，但到头来只见自己的努力在猛烈的批评之下落花流水。B.H. 利德尔·哈特的定义——“分配和应用军事手段来实现政策目的的艺术”——可以提示定义式方法的局限性，因为这个直截了当、然而并不恰当的例子将战略一词严格限于军事事务，而实际上，战略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领域运作。^①

事实上，此类简单的定义从根本上走入了歧途，原因在于战略是一个过程，一种不断的调整，以便在一个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占优势的世界上适应变动中的条件和环境。而且，这是个其他参与者的行为、意图和目的在其中保持朦胧不清的世界，使得最精明的决策者也需大伤脑筋，并且让自己的本能经受考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提出，在这么一种环境中，战略“原理、规则、甚或体系”必定总是不足，受到世界上无休无止的复杂情况的破坏。虽然模型和范畴可以有助于分析，它们却无法为成功地制定战略或操作战争提供任何现成公式。理论都太经常地针对固定的价值，但在战争和战略中，绝大多数事物都是不确定的和可变的。更糟的是，这样的方法使探究偏向于客观因素，而战略包含着人的激情、价值取向和信念，它们极少可以量化。^②

因此，现实将战略规划的制作与其大环境紧密地缠结在一起。当然，政治目标起作用，就如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资源起作用那样。这些因素显而易见，然而其他因素也以虽然较为精细、却同样至关紧要的方式影响战略思维。地理状况参与决定

① B. H. Liddell Hart, *Strategy* (New York, 1967), p. 335.

②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1976), pp. 134, 136.

一个既定的政治实体是否会发觉自己相对免受威胁，或者被潜在的对手包围。历史经验造就关于战争和性质的先入之见，并且可能产生不可抗拒的战略必需。还有，意识形态和文化既以自觉的、也以不自觉的方式塑造决策者及其社会的行动方针。意识形态和文化不仅可以在倘若持一种不同看法就会看不到有任何威胁的地方造成威胁，而且它们的影响通常还塑造对替代性方针的理解。不仅如此，政府组织的性质可以大体上决定其战略评估有多精细，决定它能够对新的威胁和机会做出多快的反应。

本文将探究这些要素，其他要素则放在以后探讨。眼下注意到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它们对战略规划工作和在战争中实施规划有巨大影响。本书将通过探测这些影响的方方面面，力图说明它们如何左右战略过程。

本书汇集的这些论文系 1985 至 1986 学年期间源自美国海军学院，当时一些投稿人正式和非正式地聚在一起讨论战略和政策。^① 参与者们认识到一项必要，即对军政领导人在回应外部挑战时逐渐形成和明确表达战略的方式进行历史的调查。他们觉得，现有的文献很大部分都集中于思想家个人的影响，^② 或者只论述一个政治实体。对于实际上铸造统治者和国家的战略的各不同要素，这两种办法都未提供多少洞察。因此，讨论越来越转向缔造战略，将其作为关键因素来理解战略这一难以捉摸的术语的根本含义。不仅如此，依其作为历史学家（或者在某些场合是惯于历史思考的政治学家）的工作的性质，他们多少深入地熟知若干具体的国家范例。于是，一部包括实例研究的书看来将能让人进行饶有教益的比较，特别是如果它涵盖多个历史时期和多类政治实体。

由此而来的这部书集中论述在其最高层次上的战略缔造，这个层次往往超越军事统帅部。它讨论为追求国家利益而使用军事力量，然而它的作者们对和平时期就像对战争时期一样感兴趣。它从这么一个前提出

① 本文作者得益于埃利奥特·科恩、霍尔格尔·黑尔维希、史蒂文·罗斯、约翰·古奇、阿尔文·伯恩斯坦、斯坦·普拉特和许多访问者，他们一路来到纽波特，在海军学院讲授“战略和政策”课程。

② 特别见两部重要书籍，一是 Edward Meade Earle,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1943)，二是该书经过修订和扩充的后继版本——Peter Paret,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Princeton, 1986)。

发：甚至运作方面绝顶的成功，也无法克服战略决策的弊端。正如对20世纪前半期的军事效力所做的一项研究断定：

不管在运作方面有多少精湛的技巧……也弥补不了政治判断方面的基本缺陷。到底是政策塑造战略还是战略必需驱动政策，并不相干。这两方面的错误估算都导致失败，而政治—战略错误的任何结合都有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对某些作为得胜联盟的成员结束战争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即使有效地动员了全国的意志、人力、工业实力、国民财富和技术知识，也未使交战国免尝（在这个层次上）犯严重错误的苦果。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政治和战略层次上做出正确决定，比在运作和战术层次上做出正确决定更为重要。运作和战术方面的错误能够得到纠正，政治和战略方面的错误却恶果难消。^①

一国战略的主线经常是容易辨识的。然而，这一战略得以逐渐形成的过程往往极为复杂；那种马汉式的观念，即认为健全的战略可以靠发现和应用永恒法则来自动生成，并不符合现实。战略思维并非发生在真空当中，亦非从事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政治、意识形态和地理状况塑造特殊的国家战略文化。这些文化反过来，可以使得一国难以逐渐形成明智和讲求实际的方法来对付它所面对的战略问题。

欧洲国家19世纪和20世纪战略文化的最奇怪的方面之一，在于军人趋于摒弃战略的政治方面，把它当作妨碍实现运作必需的某种东西。亨利·威尔逊爵士轻蔑地将英国政治家斥之为“便装外衣”，这典型地表现了世纪之交军方的态度。然而在所有欧洲人中间，德国人展示了这方面最强烈的偏向——偏向于将政治认作战争的铁骰子，一旦抛出就得收场的某种把戏。

诚然，这里有着相当大的讽刺意味，因为正是奥托·冯·俾斯麦的非凡的政治和战略智慧，使得普鲁士国家能够在仅仅遭遇其他欧洲强国最

^① Allan R. Millett and Williamson Murray, "Lessons of W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1988). 该文叙述了其作者主编的一项研究成果——*Military Effectiveness*, 3 vols. (London, 1988)——的主要发现。